

各种问
知识。
第二项
己思
底，使
受益匪

们在实
第一次他
释，第
借这一时
的教学和
与探求真
这是北
特色。其
实践为学

不难的问题，办起来却相当费力。这是因为考古专业设置在文科，文科教学配置实验设备，在北大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后经多方努力，国家教委特批才购买了第一台显微镜和有关仪器。

1978年，吕遵谔先生招收硕士研究生，经与裴文中教授商议，他为研究生选择了大型食肉类动物啃咬骨骼及敲骨吸髓破损骨骼特征作为研究课题。从此考古系与北京动物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动物拉回制作标本。在制作过程中，他和学生一起，不怕脏、不怕累，即使在夏天，动物的腐肉臭味熏天，他们也没有中止手中的实验。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旧石器考古教研室的标本已初具规模，有些标本为国内所罕见。

骨器问题初步解决后，吕先后即着手对石器使用进行研究，先后指导研究生完成了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的制作与使用研究，细石叶制作及软锤打片

（见《中国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吕遵谔

生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为考古专业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史、考古摄影等课程。

即使这样,由于我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常的培养渠道仍不能满足各地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此,吕先生在教学之余还常去各地办速成班。1974—1975年,为配合三峡工程,为沿长江各省举办了两期考古训练班,每期人数达20—30人。1999年3—4月,应洛阳文物局的邀请,70高龄的吕先生对洛阳市全体文物干部进行旧石器专业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办法,一边为学员讲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一边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开展了工作又培养了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需要,吕遵溥教授又担负起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考古专门人才的重任,为此他又在课程设置和科研计划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经过十几年探索,目前北大成为国内唯一的旧石器考古硕士、博士培养基地,现已有20多位研究生毕业走向不同岗位,无论是在大专院校,还是科研第一线都成为当地骨干力量。1998年2月为感谢吕先生的培育之恩,来自湖南、安徽、河南、山西、北京等地的20多位研究生举办了吕先生70华诞暨学术讨论会。其中关于湖南玉蟾岩、江陵鸡公山、陕西清涧盆地旧石器的报告都在近年先后跻身于中国考古学十大发现行列。

科学研究 重大发现

吕遵溥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一种科研与教学

相互促进的模式。

1960年他赴内蒙古林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可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文化革命开始后,正常教学尚不能进行,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1972年刚恢复招生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为配合三峡工程在湖北、四川进行考古调查,虽然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经常仅有土豆充饥,但在为期二年的洞穴调查中,调查洞穴100多个,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

发掘现场,后又向下发掘了半米左右,在清理了几件骨化石后,熟悉人体每一块骨骼的吕遵溥教授,当即鉴定出其中一块为人的骸骨化石,并立即指示细心发掘,终于在揭开一大石块之后发现了金牛山人类化石,计有头骨一个(缺下颌骨),脊椎骨6个,肋骨2根,尺骨、桡骨、髌骨各1个,左右腕骨9个,左右侧掌骨各1个,指骨7件,跗骨11件,距骨2件,趾骨13件,这些骨骼集中在1.6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无疑属于同

一个体。这次发现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发现意义十分重大,获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大学文科重奖。

两年之后,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1987年河北省徐水县文管所进修干部杨永贺在听了吕遵溥先生人体骨骼鉴定课后,记起《涞水报》曾报道过一个农民打地窖时发现“龙骨”的报道。闲聊中,吕先生建议他回去

作一些调查,并尽可能带一些标本回来。当这位干部几经周折找到这位农民时,说大部分骨化石已被一文物爱好者拿走,当杨永贺将剩下的几块捧回送予吕先生后,吕先生眼睛一亮,当即判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人类化石,并根据叙述认为农民家里可能还有一部分未发掘出。后经发掘鉴定,除头部为农民带走不可复原外,其余部分几乎为一完整骨架,时代测定距今5万年。关于化石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根据髌骨和髌骨的研究,虽然涞水人化石只有5万年,但金牛山人身上所保留的原始性状却延续到涞水人身上。毫无疑问,涞水人的研究对了解冀晋地区人类的进化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牛山人发现后,国内学者对金牛



在工地指导学生

石,其中有的十分罕见。

1975年,内蒙古大窑发现一批石器,邀请吕先生前去指导。经过详细的调研,确定了大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

1980年,是四川黄阳发现。黄阳人是解放后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地点,但对其时代,学术界存有异议,这次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1984年,为了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的实习问题,同辽宁省有关单位协商,在金牛山A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牛山人类化石。这一地点在1974、1975和1978年曾由有关单位进行了几次发掘,已挖至距洞底10米深处。这次发掘,首先清理了以前留下的

山人的归属及时代年代的推断，也提出了不少疑问，如“金牛山人”是否是“北京人”，是否是“直立人”，是否是“晚期智人”，是否是“现代人”。吕先生不盲从，坚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因此在1986年正式启动了“金牛山人研究课题”，由吕先生担任课题组组长。对金牛山人遗址及其附近地区的地质、洞穴发育、金牛山人生活的时期、气候、古环境、年代学等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这些工作有计划地持续了二十多年。

积干扰，这一论断在1992年国际旧石器考古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1992年刚刚结束的国际旧石器考古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吕遵谔先生在田野考古方面

吕教授去南京博物馆，即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去鉴定一些人类化石。1993年，吕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陈作新院士、王元青研究员等一起对金牛山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文物局委派吕遵谔先生任队长。在此次发掘中又发现一枚人类化石。南京博物院发现对“直立人”特征，与南方地区直立人演化历史的研究。

吕遵谔先生访问了美国自然博物馆，对人类学有了新的认识，并准备回国后对南京人化石进行综合研究。

千里。70高龄的吕遵谔先生，今年84岁，在完成《南京人》之后，又开始金牛山人的研究。我们相信，这些研究对古人类学研究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科前瞻 寄语后人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已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但其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吕遵谔先生仍深感忧虑，他指出：从发掘技术看，许多遗址尚不能按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以致许多珍贵资料因缺乏确切地层依据，在研究时失去意义，有的发掘者只顾寻找精品，将大量考古材料弃置不顾。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遗址的发掘水平达不到周口店山顶洞的水平。故提高田野发掘水平乃当务之急。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看，简单的形态分类仍占统治地位，研究者着眼点仍不能“由物见人”。

吕遵谔先生告诉我们，要想在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取得成就，首先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尤其在田野，没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很可能使重要发现流于疏忽，也可能因没有弄清层位关系，使重要发现失去意义。其次应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不要一切依赖技工，自己亲自动手制作标本，会有更多体验。第三应学会与人合作，善于吸收他人意见，才能有所突破。



在美国 DePaul 大学